

孔子周游列国，栖栖遑遑，累累然若丧家之犬，却仍然弦歌不辍，可谓自信弘毅。他的自信心表现在最为困难的时候，即匡人和桓魋之险，远恶于陈、蔡之厄。即便到了性命攸关之时，夫子亦自信地说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”（《子罕》）斯文在兹，后世不复有如此自信者也。周游到宋国那次更凶险，孔子几乎遭宋国司马桓魋之害，但仍有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”（《述而》）的浩然自信。“其如予何”这样惊天动地的信心，不惟与天同体，亦甚接“地”气，煞是可爱。

古往今来，非自信者不可成事，要让人相信自己，首先就要自信。有过人之才者，皆独立不惧，精一自信，反之则如横渠所说，“苟不自信，则终为物役”。“自信”中的“信”，既有认识论的因真知而“相信”之意，也有伦理学的“信任”之内涵。“信”属于精神层面的高级活动，没有精神这个维度，则万事难成。无论对于个人还是民族，自信而不随声附和，不以他人的意见为标准，才是自存自立之道。尼采说：“一个民族若没有能力先行评价价值，就不可能生存；一个民族要自我保存，就不能依傍邻族评价的价值。”

自信的人只要看到他人的长处，就能博采众长，兼收并蓄，有如山海不拒细微而能成其高大。自信首先是自谦，“谦者众善之基，傲者众恶之魁”，谦是治疗傲的对症之药，故《周易·谦》之六爻皆吉。

苟有自信者，以广大悉备的心胸接纳不同文明，虚心学习，去粗取精，有以教我，自信方才有根，即古人所谓“不惟自信以致之，又须好学以致之”。光凭自信，未必守得住自家藩篱。

古人云，“众必有所比……比必有所畜……物畜然后有礼……履而泰然后安……物不可以终通……物不可以终否……与人同者，物必归焉……有大者，不可以盈……有大而能谦必豫。”（《周易·序卦传》）这里的“比”意为随时“比辅”或“帮助”。而“同人”乃吉，尽管曲折，终必有收获，所谓“同人，先号咷，而后笑”。“同人”或为“聚集（军队）”，或为“和同于人”，尽管也要以类族辨物，但终究不自以为是、自我封闭，当然就会“大有”，即“物必归焉”，才能真正进益而众望所归。

气象宏大，方有胆识，方能集众家之长。王阳明把“谦虚其心，宏大其量，去人我之见，绝意必之私”视为“大头脑处”。其中，“谦虚其心”与“宏大其量”相辅相成，虚怀若谷者自有宏大气象，自满自是者浅薄而难以成事。无论如何，虚心与自信并不冲突，反倒相互成就。如康德所说，即便我们有虚荣心，但只要能够敞开胸怀听人劝导，“甚至最精细的虚荣心，如果它理解了自身，也就会发现，听人劝导所带来的成就并不亚于自信”。

当然，自信固有其善，也须把握其度，否则即为恶矣。过分自信，堕入自以为是，就成乡愿，则“不可与入尧舜之道，故曰德之贼也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妄誉和妄

毁，都是仁义之贼。遵道而行，谦虚辞让，自然有“名”。相反，“自以为是”则闭塞了通达更高境界的道路，既看不到自己的毛病，更没有学习他人的长处。所以朱子批评说，“惜乎自信太过，规模窄狭，不得取人之善，将流于异学而不自知耳。”

自以为是，则师心自用，眼中没有圣贤经典，当然不能入尧舜之道。范祖禹所谓“近世学士大夫，自信至笃，自处甚高，未从师友，而言天人之际，未多识前言往行，而穷性命之理，其弊浮而无实，锃薄而不敦”，不独他那个时代为然，可谓代代不鲜。陆九渊虽讲心学，处处要人发明本心，但也反对师心自用，以之为学者大病，因为“师心自用，则不能克己，不能听言。虽使羲皇唐虞以来群圣贤之言毕闻于耳，毕熟于口，毕记于心，只益其私，增其病耳”。不过，近世学者恰恰以此批评陆九渊，比如严复就说“夫陆王之学，质而言之，则直师心自用而已”。可见，古今自信者不知凡几，而要摆脱“自是”之讥，委实难矣哉。

“自信”与“自是”本就难以截然区分，它们甚至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悖论。不自信则不自是，而自是则已非自信了。人不能不自信，但如过分，就走向反面，变成“惑”了。所以苏轼说，“己好则好之，己恶则恶之，以是自信，则惑也。”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一切，就是刚愎自用。不知善恶之几，则为不仁矣。（《左传·宣公十年》）苟能信《论语》所谓“四毋”，绝之而为仁，否则皆是“自”病，尤以“固”为